

社会资本对流动青年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朱玲宇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 随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 流动青年作为城市社区成员的一部分参与社区治理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社会资本对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但当前对流动青年这一群体参与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本研究将以社会资本作为切入视角, 明确社会资本是如何对其参与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的。统计分析结论表明: 本研究社会资本的六个细分维度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社区治理; 流动青年; 社区参与

DOI: 10.69979/3029-2700.25.02.076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十九大以来我国坚持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形成, 并积极倡导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积极打造高水平治理共同体, 表明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也更为频繁, 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中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群体占 65.1% 左右, 可见, 流动青年已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重要主体。引领流动青年融入社区治理实践, 一方面有助于完善国家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 也能帮助流动青年懂得权利的行使。

既往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参与产生一定影响^[1]。帕特南认为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三大要素^[2], 能够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因此本研究以社会资本作为分析视角调查成都市 6 个流动青年聚居社区,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并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分析, 探讨社会资本和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谷岳、张孟见提出社会资本储备的多寡对于社区治理成效具有重要作用^[3]。涂晓芳、汪双凤通过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社区内的存量越高, 有意愿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青年人群就越多^[4]。张大维等学者认为社区内人际往来的缺乏和无法构成互惠关系网络的现状, 会降低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6]。因此提出假设 H1: 社会网络正向影响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社区归属感是指居住者对自己是所居住社区主人翁身份的认同。根据态度对行为的影响路径, 社区归属有助于激发居住者集体意识, 也显著正向影响着参与者的行为。社区参与水平与社区归属感程度的高低息息相关^[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社区归属感正向影响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互惠行为不同, 志愿主义是指个人在价值观、内部动机的推动下自愿做出的一种利他行为。刘建娥指出, 社区中具有政治身份的个体在政党组织的动员下, 通常会产生较高的志愿主义并投身到活动中^[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志愿主义正向影响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丰富的社会资本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必要保障^[9]。有学者提出当居民对其他居民以及社区组织信任程度更高时, 将会自觉地加入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实践。因此提出假设 H4: 一般信任正向影响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和 H5: 社区信任正向影响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在研究社会资本助力村改居社区治理突破困境的过程中, 崔晓磊发现, 通过优化传统的正式制度并建立现代社区的互惠规范, 可以有效激发社会资本的再生, 进而推动村改居社区居民参与度的显著提升^[10]。正式的制度标准和非正式的道德约束构成了社区互惠性规范, 青年群体如果遵守社区规定, 认同奖励机制, 其参与意愿会更加强烈, 也会更积极响应社区号召。因此提出假设 H6: 互惠规范正向影响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

综上所述, 本研究探讨社会资本对流动青年社区治

理参与的影响，在将受教育程度、性别、政治面貌、月收入 and 职业等影响因素加入作为控制变量后，最终建立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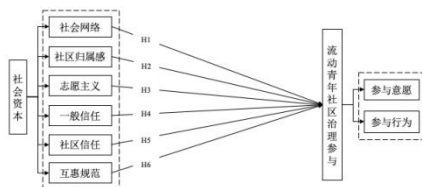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图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调查对象选择与样本回收

本文主要研究社会资本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以成都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选择了玉林北路社区、华星路社区、和美社区、西南街社区、石人北路社区和锦城社区作为调研地点，问卷发放 450 份，收回 450 份。问卷回收后，发现不合格问卷 8 份，又依据筛选条件发现 29 份非流动青年样本，均予以剔除，共收集流动青年样本 41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8%。

2.2 变量测量

2.2.1 解释变量

在参考我国学者隋广军、桂勇、黄荣贵、贾先文、方亚琴和谢治菊等人的研究，并结合当前我国社区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帕特南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互惠规范的基础上，将社会信任细分为一般信任和社区信任，同时增加社区归属感和志愿服务两个细分维度进行测量^{[7][11][12][13][14]}。对该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其总体 Cronbach 系数为 0.899。

2.2.2 被解释变量

在关于社区居民参与测量的研究中，Amy Doolittle 将参与这一过程划分为居民参与态度和居民参与行为两个层次。基于研究需要，本文综合涂晓芳、汪双凤、Amy Doolittle 和王若溪等学者对于社区治理参与的研究^{[4][15][16]}，从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两个维度来衡量流动青年的社区治理参与。对该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其总体 Cronbach 系数为 0.869。

2.2.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引入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月收入、职业、社区类型和社区居住年限共 8 个变量。

2.2.4 假设检验与结果

在多元回归分析时，本研究构建四个模型，模型 A

1 和模型 B1 仅以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模型 A2 和模型 B2 引入解释变量，验证模型的解释力度是否提高，并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对流动青年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13 流动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常 数 项	参与意愿		参与行为	
	模型 A1	模型 A2	模型 B1	模型 B2
性别	-.321*** (0.069)	-.107 (0.054)	-.261* (0.078)	-.020 (0.062)
年龄	.126** (0.046)	.021 (0.036)	.107* (0.053)	-.006 (0.041)
政治面貌	.168*** (0.041)	.068* (0.032)	.130** (0.046)	.011 (0.036)
受教育程度	-.100* (0.049)	-.114** (0.037)	-.025 (0.055)	-.039 (0.042)
职业	-.021 (0.028)	-.016 (0.022)	-.018 (0.032)	-.008 (0.025)
月收入	.061 (0.050)	.036 (0.038)	.085 (0.057)	.061 (0.044)
社区类型	-.077** (0.025)	-.003 (0.019)	-.094* (0.028)	-.010 (0.022)
居住年限	.096 (0.044)	.008 (0.034)	.102* (0.050)	.001 (0.039)
社会网络		.249*** (0.044)		.230*** (0.049)
社区归属感		.107* (0.045)		.132** (0.051)
一般信任		.177*** (0.049)		.145** (0.055)
社区信任		.111** (0.041)		.140** (0.046)
志愿服务		.108* (0.046)		.229*** (0.051)
互惠规范		.139** (0.045)		.111* (0.052)
R ²	0.166	0.522	0.113	0.490
调整后 R ²	0.149	0.505	0.095	0.472
F 值	10.041***	31.016***	6.422***	27.284***

注：*p<0.05; **, p<0.01; ***, p<0.001

如上表所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社区类型和居住年限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流动青年的参与意愿和行为的作用是显著的，其中，女性、36-40 岁段、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的流动青年具有更多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同时，居住在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的流动青年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和行为更高。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六个因子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形成模型 A2、B2。由表可知，模型 A2、B2 调整后的 R² 增加明显，分别达到 50.5% 和 47.2%。从六个维度分析结果来看，流动青年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及行为受到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

社会网络资本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社会网络资本越丰富的流动青年越倾向于参与到社区活动当中。社区归

属感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社区归属感会激发流动青年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推动流动青年融入到公共事务讨论中,社区归属感越高,越会回应社区组织的号召。一般信任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对社区内其他居民的信任程度会影响到对社区人际交往的认可度,信任程度越高,越认可其他居民所作出的贡献,并愿意参与到环境维护、志愿活动等社区治理相关活动中。社区信任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社区信任越高,流动青年越相信社区内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最终有利于推动流动青年主动参与到对自身利益产生影响的权益争取和决策活动之中。志愿主义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志愿精神越强的流动青年社区治理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就越高。互惠规范对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社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健全的解纠机制,能够在流动青年利益受损时,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进行沟通协商解决,维护权益。通过增强对其他居民和社区组织的信任程度,最终提高他们的参与程度。以上数据表明,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H1、H2、H3、H4、H5、H6均成立。

4 讨论与总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但现有研究多从宽泛主体和客观条件两方面分析社区治理,对社区居民的细分和影响因素的细化存在欠缺。因此,本研究着眼于流动青年这一细分主体,基于社区社会资本和流动青年自身特征的视角,从环境中观因素挖掘提高流动青年城市社区治理参与水平的有效机制。

从全文研究可知,流动青年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意愿与行为受到社会资本的显著正向影响。在面对社区治理等社区公共事务时,社会资本储备较高的流动青年,因日常生活中与社区居民频繁的沟通和交流,会对其参与社区治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流动青年作为城市中融入感和归属感知较低的群体,通过社区内互帮互助的行为得到了社区内其他居民的认可与尊重,这种“非正式团体”的认同,会激发流动青年个人的责任感,提高其对社区的归属感,进而对社区事务采取更加负责的态度和更为积极的行为,为维护共同居住的社

区达成合作。

参考文献

- [1] Onyx J. & Bullen P, 2000.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36(1):23-42.
- [2]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0-45.
- [3] 谷岳, 张孟见, 2008.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建设中角色参与机制研究[J]. 经济与社会发展, 6(7): 18-20.
- [4] 涂晓芳, 汪双凤, 2008.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J]. 政治学研究(03): 17-21.
- [5] 张大维, 殷妙仲, 2010. 社区与社会资本: 互惠、分离与逆向——西方研究进展与中国案例分析[J]. 理论与改革(02): 22-27
- [6] 方亚琴, 夏建中, 2014.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测量[J]. 城市问题(04): 60-66.
- [7] 刘建娥, 2014. 青年农民工政治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2084份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J]. 青年研究(03): 11-18+94.
- [8] 张汝立, 刘帅顺, 2022.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 类型、特征与再生产[J]. 求实(1): 27-42, M0004.
- [9] 崔晓磊, 2018. 社会资本再生产: 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及纾解机制研究——以山东省淄博市S安置小区为例[J]. 理论观察(06): 90-94.
- [10] 隋广军, 盖翊中, 2002.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J]. 学术研究(07): 21-23+131.
- [11] 桂勇, 黄荣贵, 2008.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 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03): 122-142+244-245.
- [12] 贾先文, 2010.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J]. 求索(07): 53-55
- [13] 谢治菊, 谭洪波, 2011. 农村社会资本存量: 概念、测量与计算[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05): 87-93.
- [14] Doolittle A. & Faul A. C, 2013. Civic Engagement Scale A Validation Study[J]. SAGE Open, 3(3).
- [15] 王若溪, 李俊清, 2022. 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宁夏城市社区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2(06): 77-84+184